

質性研究倫理的基礎：「樹與根」或「地下莖」隱喻

宋明娟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一、前言

廣義而言，研究倫理可指涉探討研究行為從初始設計、實施或成果發表的倫理議題，而特定來說，意指以人類為對象之研究的倫理探討；從歷史發展來看，關於研究倫理的學術討論，主要是源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學術界反思了生物醫學領域進行以人類為受試者的研究，卻忽視受試者的身心福祉（蔡甫昌、林芝宇、張至寧，2008）。這種源自生物醫學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思維，應用到了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質性研究，卻時常顯得格格不入（Doyle & Buckley, 2017）。本文旨在探討質性研究倫理的基礎，先談上述源自生物醫學領域的研究倫理傳統以及在質性研究倫理上的適用問題，再引介 Facca 和 Kinsella（2023）援用法國思想家 Deleuze（德勒茲）和 Guattari（瓜達里）提出相對於「樹與根」的「地下莖（rhizome）」思維模式隱喻，主張「地下莖倫理學取向」（rhizo-ethics approach）的質性研究倫理，梳理相應的應用思路。

二、研究倫理之基礎：其來源以及在質性研究方面的適用問題

研究倫理方面的學術討論，較早的如 1947 年的紐倫堡守則（the Nuremberg Code）是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醫師進行違反人道的人體試驗提出反思，而後確立研究倫理之知情同意的重要性；又如 1964 年世界醫學大會通過赫爾辛基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更確立了對受試者福祉考慮的優先性；而 1976 年美國的「生物醫學及行為研究之人類受試者保護國家委員會」則經多次討論，於 1978 年揭示適用於諸多以人類為受試者之研究的「貝爾蒙原則」（the Belmont Principles），即尊重人格（respect for persons）原則、行善（beneficence）原則，以及正義（justice）原則（洪瑞斌、莊騏嘉、陳筱婷，2015；蔡甫昌等，2008；Doyle & Buckley, 2017）。

「貝爾蒙原則」原則中，「尊重人格」原則的應用為知情同意，「行善」原則之應用為風險與利益評估，「正義」原則之應用，則為受試者的挑選需有公義的程序與結果（蔡甫昌等，2008）。上述源於生物醫學領域的這些研究倫理原則被廣泛應用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包括了質性研究（李安明，2016；洪瑞斌等，2015）。不過這樣的類推應用，有其根本問題，即生物醫學領域的實證主義思維，預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主客二分對立的關係，然而質性取向的研究，尤其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質性研究，則注重人的主體性，以及研究依情境而變化的特質（Doyle & Buckley, 2017）。因此在質性研究倫理方面，如應用上述來自實證主義的原則，背後的預設則是為了尋找客觀既定的真理，並以主客對立的觀

點來看待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其所衍生的可能問題，比如其一，視「研究參與者」為缺乏能動性的「受試者」，且需要完全匿名的保護，但實際上許多人文或社會研究的研究參與者並不是被動的受試者，甚且研究參與者本身可能即為某領域的專家學者；其二，在許多情況下，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若未深刻檢視質性研究的性質，僅依循實證主義觀點來審查質性研究計畫，則傾向認為研究在實施之後必需絕對依循研究計畫，忽略了研究倫理需因應研究實施後的可能變化情境，而產生變通作法；其三，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的關係，可能會隨著研究的進展而發生改變，研究者在研究開啟之初，實際上難以全然掌握詳細計畫（Doyle & Buckley, 2017）。

三、質性研究倫理之基礎：相對於「樹與根」的「地下莖」比喻

上述有關質性研究之研究倫理，在歷史發展上源於生物醫學領域之實證傳統的問題與限制，其可能的出路為何？Facca 和 Kinsella（2023）提出「地下莖倫理學取向」（rhizo-ethics approach）的質性研究倫理，或可作為參考思路。Facca 和 Kinsella（2023）的論述來源，是借重 Deleuze 和 Guattari（1980/1987）在《千重台（*A Thousand Plateaus*）》一書中，將思維模式作「地下莖」的隱喻。

Deleuze 和 Guattari（1980/1987）的「地下莖」隱喻，是相對於「樹」的隱喻而提出的。Deleuze 和 Guattari（1980/1987）指出，西方的思想界在各種領域方面，其傳統向來是「樹」的思維模式，致力於追尋特定的來源或終點，即「樹」植基於穩固的「根」，樹的生長發展有特定的定點和位置的階層結構，其發展是預定的，起源也是確定的；而他們所提出的「地下莖」思維模式，則指涉「地下莖」的特質。地下莖是土壤表面下的莖的統稱，其外型常呈水平走向，功能是貯存養分、繁殖新植株（維基百科，2021）。Deleuze 和 Guattari（1980/1987，頁 7）提及，「地下莖」不分好壞，如馬鈴薯、螃蟹草或雜草等，其任何一節點都能夠連結到其他方向與位置，這是「地下莖」和「樹」很不一樣的地方。地下莖沒有開始或終點，它處於中介狀態，能夠與外界產生動態的連結。地下莖的生長可從多方向延伸，它不是由一系列的點和位置所限定的結構，而是由多面向的分支連結著；它不帶有特定的記憶，它的運作是藉由長出旁系分支、不斷地擴展領域而變化（Deleuze & Guattari, 1980/1987）。

在質性研究方面，已有一些學者藉由論及上述「地下莖」的思維方式，論及質性研究者可採取地下莖的觀點來看待本體論，認為質性研究的本體論基礎並不是階層化及結構化的；Facca 和 Kinsella（2023）的「地下莖倫理學取向」也抱持這樣的觀點，他們著眼於 Deleuze 和 Guattari（1980/1987）談及「地下莖」思維模式的特質：不可預期的、充滿可能性的、突現創生的，以及多元連結的；據此 Facca 和 Kinsella（2023）正視在研究脈絡變化中的研究倫理，如提倡去階層化和

去中心化的思路、承認研究過程中會有權力關係的變遷流動、抱持著關係取向的本體論與知識論、考量研究倫理不只關心人際互動，也重視人與非人類之互動的倫理議題等，另外，他們也耙梳相關論述，提到「地下莖」的思維對研究的再現（representation）形式也提出挑戰；如認為在研究寫作的形式上，主流的質性研究寫作仰賴寫作的既定元素－情節發展、意義、內在一致性、普遍的結構等，對此應力求創造性的突破，進而更加強調質性研究的多元化與異質性。

四、評論與啟示－代結語

關於質性研究所涉及的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的討論，已揭示了豐富的思潮來源對質性研究的影響（張芬芬，2007；陳向明，2002）；然而實際上，就教育方面的質性研究來說，研究倫理之基礎的歷史來源以及實務應用現況，至今卻不一定受到充分關注。以 Deleuze 和 Guattari（1980/1987）的「地下莖」思維模式，作為質性研究倫理的基礎，是著眼於研究情境中，可能萌發的各種動態變化、連結和發展，其相對於以實證主義為出發點的預設來說，更加凸顯了能回應質性研究者看待世界之觀點的豐富性與多元化。對於進行質性研究的研究者來說，思考研究倫理的議題，「地下莖」的思維模式不失為可參照的觀點。

在具體層面而言，面對質性研究的倫理議題，「地下莖」思維模式能啟發研究者適度放下呆板劃一的標準，考量質性研究情境的變化，破解研究倫理既有成規的未盡適用之處，做出彈性的因應調整。尤其就教育方面的研究而言，教育帶有促進學術知識建構、關懷在地教育議題，以及改進社會的責任（甄曉蘭，2017），教育的質性研究倫理尤應敏於研究場域的情境脈絡。回應上述「地下莖」思維模式之充滿可能性的以及多元連結的特質，在教育的質性研究倫理上，建議可採行的作法，例如：了解研究倫理相關論述的學術起源與其應用限制、珍視教育研究情境中的個別研究參與者之獨特性與能動性、關注研究中涉及的人際關係及其可能的改變、接受質性研究歷程隨著時間進展而或有非預期的變化，以及鼓勵並接納多樣化的質性研究的再現形式。另外，有關質性研究倫理的評估與審查，其評斷標準應能關注因應個別特定案例而有彈性變通的考量；如 Doyle 與 Buckley（2017）即發展了一個能適應多元情境的研究倫理審視模式，在保密性、知情同意、研究的貢獻，以及造成傷害的風險等幾個向度上，都囊括不同程度的適用性，其雖未必完善，卻能為質性研究倫理的評估與審查，需依情境而考慮的幾個向度，提供可參考的線索。

參考文獻

- 李安明（2016）。從教育領域的質性研究談研究倫理議題。《教育研究月刊》，272，30-43。

- 洪瑞斌、莊騏嘉、陳筱婷（2015）。深思敘說研究之研究倫理議題：回到倫理學基礎探討。*生命敘說與心理傳記學*，3，55-79。doi: [http://dx.doi.org/10.6320/FJM.2008.12\(1\).12](http://dx.doi.org/10.6320/FJM.2008.12(1).12)
- 張芬芬（2007）。後現代質性研究：特徵及其對課程研究的蘊義。*課程與教學季刊*，10(3)，31-48。
-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臺北：五南。
- 維基百科（2021）。*地下莖*。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C%B0%E4%B8%8B%E8%8E%96>
- 蔡甫昌、林芝宇、張至寧（2008）。研究倫理的歷史、原則與準則。*臺灣醫學*，12(1)，107-122。doi: [http://dx.doi.org/10.6320/FJM.2008.12\(1\).12](http://dx.doi.org/10.6320/FJM.2008.12(1).12)
- 甄曉蘭（2017）。驀然回首，盼見教育研究的社會影響。*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8(3)，111-114。
- Doyle, E., & Buckley, P. (2017). Embrac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 visual model for nuanced research ethics oversight. *Qualitative Research*, 17(1), 95-117. doi: 10.1177/1468794116661230
- Deleuze, G. & Guattari, F. (1980/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B.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acca, D. & Kinsella, E. A. (2023). Emergence, multiplicity and connection: Rethinking ethical discernment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rough a rhizo-ethics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36(8), 1526-1540. doi:10.1080/09518398.2021.1930248

